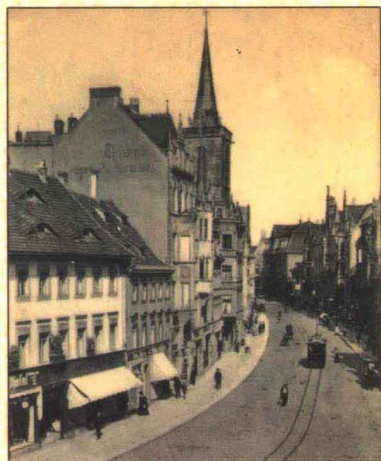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TRANSLATION

文化翻译学

——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

(第二版)

王秉钦 /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文化翻译学 (第二版)

——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

王秉钦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翻译学: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 / 王秉钦著. —2 版.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4
(高等院校翻译专业必读系列)
ISBN 978-7-310-02654-8

I. 文... II. 王... III. 文化学—翻译理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G0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1487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0 375 印张 2 插页 292 千字

定价:2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 (022)23507125

再版序言

本《文化翻译学》，于1995年初版，经10年教学实践，得到方家及读者的肯定，今修订再版，并加副题“文化翻译理论与实践”，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关于文化翻译，借再版之机，欲谈三点。

一、文化翻译研究简短回顾：奠基性的尝试

文化研究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学术界，最初的立论基点是文学领域，70年代初，随着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文化研究逐步纳入翻译理论研究领域。80年代初“文化翻译”这一概念被正式引入我国。王佐良先生可以说功不可没。1984、1985两年王佐良先后发表了《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和《翻译与文化繁荣》两篇文章，论述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应当把翻译置于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强调文化观点和历史意识。他说：“翻译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在翻译中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王佐良先生积极提倡把翻译研究与作为一门新学科的比较文化结合起来。他说：“如果我们能进而探讨翻译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作用，或者进一步把它同比较文化这个新学科结合起来，那就会使我们在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更能透视全局，综观古今，更能根据不同对象，提高实际效果。因为文学翻译的研究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他的呼吁和他的翻译与文化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国内出现了一股“文化翻译热”，一度形成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学派”，王佐良的文化翻译思想，在我国具有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当时出现了一批研究文化与翻译的论文和著作。笔者的《文化翻译学》即为其中之一。王氏这种从文化层面上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可以说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本质性的进步。这一翻译观点与当代西方译学“文化转向”观点几乎是同步的。当代西方学者谢莉·西蒙指出：“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Routledge, 1996.）（见拙著《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

“文化转向”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出现了一场变革，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把翻译定位为跨语言跨社会的特殊文化活动。这极有利于使翻译学突破长期以来附庸于语言学或文学的状况，而逐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这本《文化翻译学》正是在王佐良的文化翻译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运用德国学者哈贝马斯（Jurgena Habermas）提出的“沟通”理论，把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置于人类文化交流这个宏大背景和综合关系网络之中，置于世界科学这个开放的复杂的体系之内，从其他学科特别是一些新兴学科吸取营养，借助学科群的知识，拓宽自身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构建文化翻译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基于对文化系统的哲学分析，从时空系统、主客观系统和物理心理系统入手，构成基本理论体系，以“观念论”、“行为论”和“影响论”三论涵盖文化学的三个子系统（物质文化、制度习俗文化、精神文化）的中心内容。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凸显译者的文化精神，注重以译者主体的创造性来确立文化翻译的方法原则，尝试为文化翻译建立系统的方法论体系和相应的规则系统。这一切，正是为探索建立一门新学科——文化翻译学所做的奠基性的基础工作。当然，作者

深知，作为一门“学”，本书还远未入于壶奥，仍是一名逡巡堂前的探求者，永远的探求者——穷尽毕生之精力。

二、文学（化）翻译“范例”：俄罗斯文学名著优秀译例的选择

本书为什么在语料例证取舍上，几乎大部分选择俄罗斯文学名著译中优秀译例？目的在于显示文学语言的榜样之力量，同时也体现出理论来源于实践的思想。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些出自大师名家之手的文学名著优秀译例，就没有这本《文化翻译学》，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不过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

拉开时间的帷幕，跨过空间的阻隔，我们从浩如烟海的俄罗斯文学宝库中选择了上百部（篇）经典小说和散文。它们每部（篇）概出自大师名家之手，均为脍炙人口之作。就散文而言，它们或咏物，或抒情，或记事，或论理，或鸣志，皆融真善美于一体；它们或是自然的启示，或是人生的探索，或是社会的思考，都透着热爱真理，热爱人类，热爱生活，向往光明的博大精神，它们文字优美，文笔精湛，典雅和谐，洗尽铅华，风格各异，或意蕴精深，或气势恢宏，或委婉含蓄，或热情澎湃，都辉耀着人类智能的闪光，“旷兮其若谷；澹兮其若海”。它们篇篇是精品，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完美结合的文学精品，更是学习翻译的“样板”和典范。我们正是从这些文学精萃中，在精心对照阅读，用心感受翻译艺术真谛的基础上积累了上万张卡片，又从文化与翻译角度精挑细选出数百余例，构成《文化翻译学》论证翻译理论和方法的重要依据（见附录三）。

这样做，也有意无意地总结了翻译名家的翻译方法和经验，把名家手下之妙笔集中展现给学习者，使学习者在有限的时间（学时）里能接触到更多的各种各样的翻译现象，开启更广阔的思路。这对于更快地提高学习者的翻译实践水平具有不可估量的直接的典范作用。

也正因为这些优秀典型的例证源于名著名译，出自名家大家之手，才更加有力地支撑了作者的观点和思想，同时也提高了本书的科学性和可信度。一般说来，文学例证较之其他语体（如政论、科技等）例证更具典型意义和指导意义，且有一定的难度，因而也为教师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更大的空间。因为文学翻译是一切翻译形式的母体。

三、感悟（文化）翻译：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

本书出版10年来，作者一直在潜心思考，感悟翻译。孔子《论语为政》中有一句名言：“从心所欲，不逾矩。”其原文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最后一句的意思是说，70岁的人心里怎样想或怎样行动都不会超越规矩。翻译大家们把孔子论说人生的规律运用于翻译艺术规律，十分贴切。它体现了翻译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全过程，准确地诠释了翻译的哲学实质。这应该说是每个翻译家的最高追求。

回首自己走过的翻译之路，走的正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全过程。在南开近半个世纪的学府生涯中，一直从事翻译研究与教学。前期主要是从事翻译实践，后期专重于翻译理论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去探索翻译，感悟翻译。后期撰写了《文化翻译学》和《语言与翻译新论》，力图从文化与语言（特别是语义）两个视角系统剖析翻译的本质，寻求翻译规律。寻规律，立规矩，在“术”和“道”上做文章，应该说这些努力都是为了“不逾矩”，为了在“不逾矩”的前提下，走进“从心所欲”的最高境界。这是我在“必然王国”中的必然追求，也是必经之路。今天，《文化翻译学》的修订再版，依然本着这一原则。

然而，翻译必须完成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全过程的过渡。我自接受撰写《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一书任务后，在发掘、探索、研究、学习大师们的翻译思想过程中，心灵不断受到撞击，逐步把自己从“必然王国”带入到了“自由王国”。

翻译大师钱锺书、朱光潜、许渊冲在其著作中曾反复引用并论述孔子这一思想对艺术和翻译的重要意义。朱光潜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当然，也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因为文学翻译也是一门艺术。译者要达到这种自由的艺术境界，完全取决于其高深的文学素养和深厚的语言功力，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才情，以及丰富的翻译实践。搞文学翻译不追求境界，止于“术”与“道”，那是远远不够的。那只走了一半的路程。古人云：“运用

之妙，存乎一心。”这次修订本书，有意识地把这种感悟写进书中，渗透于字里行间。

以往在这方面曾有过深刻的教训。在“文革”浮躁年代刮过一股“名著重译风”。当时我校也曾接受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译高尔基《母亲》的任务，曾组织 15 人进行集体翻译，以“南凯”（“南开”谐音）笔名出版。译本质量可想而知，重译本也可能在一些具体的“术”和“道”上有所长，甚至改正一些疏漏，然而与原译本相比，在整个艺术作品的“艺术境界”上，在其“文学艺术价值”上，却是望尘莫及的。因此，该出版社在出版《高尔基全集》（中译本）时，毅然选择了夏行的《母亲》译本。这是明智的选择。要知道，“艺术境界”是一个优秀翻译家毕生追求的目标！

有了这个境界，在做翻译时，才能抓住原作的灵魂，实现“灵魂转生”，真正译出有“译者个性”的文学精品。

最后，谈谈修订本书的指导思想。本书遵循“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提出一些有关文化翻译的新思想、新观念、新译论，充实一些新语料，并对一些优秀的翻译作品译例进行评论和实践检验，侧重于从实践角度印证翻译理论的正确性。同时也从中看到，代表性译例（句段）所具有的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对学习者的榜样力量，以加深对翻译理论学习的自觉性，提高自己的翻译实践水平，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为日后顺利踏上翻译之途，提供一份充足的精神食粮。这就是修订本书的目的。

在本书收笔之时，我有如是企想：唯愿在不久的将来，这块抛出去已经 10 年的“砖”能引出一块“宝玉”——一部新的文化翻译学的诞生。这就寄希望于现在的年轻一代了！我坚信一定会实现！信其然，不是幻。

秉公

2006 年秋于南开园

初版序言

语言、文化、翻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是语言的管轨。

翻译是跨文化的传通。

文化翻译学则是研究和探索三者之间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

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特征，其一，它是一种自主的，有意识的行为，其二，语言是一个人类社会的传统的机构，是人类交际、传达信息的重要工具。语言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因此，任何一种语言都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都生长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上。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强调必须在文化环境中处理语言现象和在社会背景中研究言语。这就是说，语言反映文化，又受文化所制约。语言有许多功能，它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还有载蓄功能（кумуля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就是靠语言的载蓄功能才得以流传下来。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 Sapir, 1884~1939）所说：“语言是我们所知的最硕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语言论》）我国的汉语学家罗常培先生也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语言是保存文化、交流文化的工具。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由于它们各自的内涵与外延不同，是局部的交叉渗透的关系，不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那么，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又如何呢？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 迪

尼教授指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熟悉两种文化与翻译》）美国翻译家奈达也说过：“对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关系如何沟通？如何构建其理论框架？我们认为，普通翻译学作为本体翻译学无法担当这一任务，只能由具体翻译学——文化翻译学来完成。普通翻译学是一个由相关的系列学科组成的“综合体”，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非自足系统，是一个开放性的多维系统，而文化翻译学则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沟通和调节语言、文化、翻译三者关系的“杠杆”。

本书试图运用哲学观点，以“时间—空间系统、主观—客观系统、物理—心理系统”三大系统为理论依据，以“观念论——行为论——影响论”“三论”（或称“物化文化态、观念文化态、语义层文化态”“三态”）为中心命题，以语言的文化功能及其表达为主要对象进行研究。这也是我们所初步理解的文化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但是，本书不是研究一般的语言现象，更不是对语言中每一种现象都从文化中寻找答案，而是渗透到文化活动的各个领域，专门研究和反映这些领域中直接影响交际的那些独特的语言现象，或称超语言因素，即历史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积淀在语言系统中，反映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的特征，诸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心理状态以及文化背景知识等等。也就是说，在翻译中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因为语言的背后隐含着人文历史特点，体现着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从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上把握民族语言的特点。一句话，我们把这些语言现象当作一种文化“镜象”，当作对俄汉两种语言系统中历时和共时形态所反映的两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特征的透视。通过这种镜象的透视，使我们看到语言所具有的极大的文化渗透力和文化涵盖力及其在整个翻译活动中的深刻的制约作用。

这就给翻译工作者提出一个任务，译者必须熟悉两种文化，本国文化和对象国文化。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的，“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在翻译实践中要不断培养和增强自己的两种文化意识，自觉运用比较的方法，注重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异同，特别是“异”，从而建立正确的文化翻译观。这就是撰写本书的目的。

本书曾作为南开大学俄语语言文学和翻译方向研究生教材，经多次使用，几易其稿，最后成书。山积而高，泽积而长。而本书撰著只是一种尝试。只能算是本人在近年来探索文化与翻译这条道路上艰难跋涉的一段记录。如果把当前国内迅速兴起的语言国情学、跨文化交际学、文化语言学诸多的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当成一阕宏大的多元交响乐的话，那么这本文化翻译学就算是加入这阕交响乐的一个乐章吧。

本书在成书前，部分章节曾以论文形式在全国几家外语和翻译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投石问路，引起外语界关注。其中《东西方思维方法差异及其翻译》和《词的文化伴随意义与翻译》被收入《文化与语言（论文集）》（王福祥、吴汉樱主编，外研社）。之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 Н. Г. Щербakov 教授在给我国国家教委对外合作司的邀请我讲学的信函中写道：“王秉钦教授在俄汉、汉俄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造诣很深，曾出版有书籍和大量论文。我们对他的翻译理论著作评价很高。”国内外学者的评价增强了我写作和出版本书的信心。

李学建同志参加了下篇编写工作。

本书在撰写和出版过程中，幸承南开大学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张敬双先生和白莉女士鼎力相助，对他们这种固本弘扬学术，发展科学事业之精神，秉公心殊铭感。

本人学识有限，教学繁冗、羁旅频仍，笔下疏误难免，敬希读者专家不吝赐教。

秉 公

1994年夏于南开园

目 录

再版序言

初版序言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引子：关于人类文明	1
第二节 关于文化	3
第三节 关于文化学	5
第四节 关于文化翻译学	9

上篇 观念论

第二章 东西方思维方法差异与翻译	17
第一节 东西方思维方法差异与语言表达方式差异	19
第二节 东西方思维方法在感知和取向上的 差异与翻译	27
第三节 中国古典思维方法与翻译	34
第三章 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差异与翻译	38
第一节 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差异	38
第二节 价值观与心态系统	42
第三节 原作的文化价值与译作的忠实性价值	45
第四章 中国古典文论思想与翻译	50
第一节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诗眼论”与翻译中的 “神韵说”	50
第二节 中国古典诗文的语义论与翻译中的动静观	56

第五章 宗教文化与翻译(一)

- 宗教对文学的影响与翻译 63
- 第一节 宗教与文化 63
- 第二节 《圣经》与西方文化 65
- 第三节 文学作品中宗教语言的翻译 69
- 参考资料:《圣经》各卷名(汉/英/俄)、执笔者、
写作地点、成书时间年表 77

第六章 宗教文化与翻译(二)

- 宗教文化的时空观与翻译 82
- 第一节 宗教文化的空间层次与翻译的“深层转换” 82
- 第二节 宗教深层文化:关于宗教观念与翻译 85
- 第三节 宗教中层文化:关于宗教行为与翻译 94

中篇 行为论

第七章 语言文化差异与翻译(一)

- 词的社会文化意义 101
- 第一节 词的社会文化意义与翻译 101
- 第二节 词的社会文化意义分寸感的把握 104
- 第三节 词的社会文化意义隐含性的表达 111

第八章 语言文化差异与翻译(二)

- 词的文化伴随意义 118
- 第一节 文化“空缺”论与文化伴随意义 118
- 第二节 具有文化伴随意义的词与翻译 126

第九章 语言文化差异与翻译(三)

- 翻译中的“文化的痛苦”(不可译性) 132
- 第一节 不可译性与“归化”和“异化” 132
- 第二节 关于熟语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翻译 136
- 第三节 关于汉语仿词与翻译 150
- 第四节 关于双关语与“等效翻译” 158

第五节 关于回文、隐语与翻译	166
第十章 专名文化与翻译（一）	
——人名文化	175
第一节 中西人名文化差异	175
第二节 中西人名命名习俗比较	179
第三节 中外文学作品人物命名的文化内涵透视	183
第四节 关于人名的翻译	187
第十一章 专名文化与翻译（二）	
——地名文化	191
第一节 河流名称的历史文化内涵	192
第二节 城市名称的历史文化内涵	194
第三节 写意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	200
第四节 关于地名的翻译	203
第十二章 饮食文化与翻译	
——菜名文化	206
第一节 中国的饮食文化与翻译	206
第二节 俄罗斯的饮食文化与翻译	211
参考资料：世界主要（欧亚）国家饮食文化的历史 和特点（俄文简介）	217
第十三章 非言语交际的文化差异与翻译	225
第一节 非言语交际及其功能	225
第二节 非言语交际的文化差异	231
第三节 非言语交际的语境与翻译	240

下篇 影响论

第十四章 外来文化与翻译（一）	
——外来语的影响	247
第一节 东西方外来语的影响	248
第二节 外来语的国际化与翻译	258

第三节 文学作品中外来词的翻译	261
第十五章 外来文化与翻译(二)	
——外来商标词	264
第一节 外来商标词的构成与特点	264
第二节 外来商标命名的心理因素	268
第三节 译者的文化翻译观	270
第十六章 汉文化的西渐	
——中国茶文化对世界茶道的影响	275
第一节 茶——ЧАЙ, ТЕА 探源	276
第二节 茶道	277
第三节 茶俗与翻译	280
第十七章 文化翻译实践	
——文化意识和精品意识	284
第一节 文化意识：“投胎转世”是翻译的灵魂	284
第二节 精品意识：“译者个性”是翻译作品的生命	286
跋	296
附录一：王秉欽先生的翻译艺术探索(郑海凌)	298
附录二：走近成功	
——论外语人才应具备的三种结构	302
附录三：成功发于点滴	
——从“发现是成功之门”谈起	306
主要参考文献	311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引子：关于人类文明

关于人类文明。

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不同路径形成了三种不同文化形态。

· 古希腊文明——西方宗教文化

人由自然界脱胎而来，早期人类自脱离自然母体之后，在精神上仍留有一条剪不断的“原始脐带”——这就是人们所信奉的“自然崇拜”，其中最典型的是“图腾崇拜”（参阅本书第六章，关于“图腾崇拜”一节）。“图腾崇拜”包括两大因素：自然因素和血缘因素。它是自然与血缘两大因素的神秘统一，也是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三大区域共同具有的人类学前提。古希腊人在海洋文明的基础上抑制了“图腾崇拜”中的血缘因素，而将自然因素神秘化，换言之，弱化了血缘成分，神化了自然成分，将之转化为一种与血缘无关的宗教信仰，于是出现了西方宗教文化。

· 古中国文明——儒家伦理（宗法）文化

古代中国人与古希腊人恰恰相反，在黄河文明的条件下，对“图腾崇拜”中的自然因素采取了抑制的态度，即弱化其自然成分，而对血缘因素则加以强化，实现世俗化，这样一来，必然从图腾物与氏族之间的“血缘关系”中演化为“祖宗崇拜”^①，也就是血缘的人

①《史记》中记述了夏、商、周三代王族谱系。夏的创始人是禹，禹的父亲是鲧，鲧的父亲是颛顼，颛顼的父亲是昌意，昌意的父亲是黄帝；商的先人名契，契母简狄为帝喾之妃，而帝喾又是黄帝的曾孙，周的先人是后稷，后稷之母姜嫄也是帝喾之妃，同祖于黄帝。这就是以黄帝为源头的“宗族的谱系”。换言之，这也就是中国人由“血缘关系”演化为“祖宗崇拜”的源头。

化，进而升华为世俗伦理精神，导致了儒家伦理（宗法）文化。

· 古印度文明——种姓制度文化

至于印度人，与希腊人和中国人都不同，他们是同时利用自然与血缘两大因素，即一方面将自然因素神秘化，另一方面又将血缘因素宗教化，这样就形成了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文化（四大种姓中第一种姓：由祭司阶层发展而来享有文化特权的“婆罗门”；第二种姓：由武士阶层发展而来享有军事特权的“刹帝利”；第三种姓：由农民、牧民、商人、手工业者发展而来的“吠舍”；第四种姓：由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和失去生产资料的雇工、奴隶所组成的“首陀罗”）。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地域、宗教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由于民族心理和社会结构的不同，则出现了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表征。这就是造成翻译上文化障碍的历史渊源。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东西方文明，不包括印度文明。因为它既不同于东方，也不同于西方。正如美籍华人学者许烺光所指出的：“马克思·韦伯对西方人的一种误解的长期流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误解是：印度教徒、埃及人和阿拉伯人都是东方人。韦伯认为印度文明不过是东方文明的一支，其余的两支是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然而，印度教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从家庭结构、政治发展、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或种姓制度去考察，它同东方的差别和西方的差别一样大。”（参见《宗族、种姓、俱乐部》，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我们研究的重点是：东西方文化特征在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西方人：由于弱化，或者说较为彻底地斩断人与人之间原始亲情血缘关系，人与人处于各自独立的单子状态，享有个性自由。不问年龄、辈分、财产、地位如何，在人格上一律平等。在“自我依赖”的信念下，人与人在物质层面上是交换的、对等的、契约的关系。要实现人与人在情感上的沟通与交流，须借助于超血缘的中介——宗教——希腊人创造的自己的“神学体系”（从野蛮而又富有图腾意味的“提坦诸神”——到安逸而又富有城邦特征的“奥林波